

新时期小说研究之

新时期 小说论评

胡若定 著

QIXIAOSHUOLUNPING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研究之一

新时期小说论评

胡若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南京

内 容 提 要

“新时期小说研究”是国家教委“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承担，共出三本书，本书是其中之一。本书分为“反思与突进”、“人性的潮涌”、“改革与小说”、“悲剧的魅力”、“‘现代主义’东渐”、“探索的热潮”六个专章，结合创作实践，对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五十多位中青年作家的近九十部有代表性的长、中、短篇小说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评析，并从实到虚，就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发展、现代主义的借鉴、新潮小说的得失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既肯定了创作的成就，也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对了解与研究新时期小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用于大专院文科师生、文学工作者与广大文学爱好者。

新时期小说研究之一 新 时 期 小 说 论 评 胡若定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练湖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字数 230 千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305-00431-6

目 录

序	董 健 (1)
小说创作的春天	(15)
第一章 反思与突进	(23)
反思昨天：历史的悲剧	(25)
反思前天：历史的错位	(34)
整体反思：历史的曲折	(45)
现实主义突进	(53)
第二章 人性的潮涌	(66)
人性的美	(70)
爱情的美	(82)
人的发现	(94)
发展与倾斜	(107)
第三章 改革与小说	(116)
激流与潜流	(119)
起飞的艰难	(129)
改革的阵痛	(144)
文学的回顾	(155)
第四章 悲剧的魅力	(166)
芳菲的劫难	(169)
星星的陨落	(182)
山岳的崩塌	(193)
悲剧的美学	(208)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东渐	(220)
观念的嬗变	(223)
意识流与象征	(232)
怪与荒诞	(246)
差异与前景	(257)
第六章 探索的热潮	(269)
文化寻“根”热	(272)
“现代主义”新潮	(287)
小说纪实热	(301)
退潮的反思	(313)
后记	(324)

序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在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如果大学的中文系对当代文学的最新成就和发展状况没有反应，没有发言权，这是它缺乏当代意识、在文化感应上失去活力的表现。反过来说，加强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又有利于增进中文系的当代意识和文化感应上的活力，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和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思想活跃、敏锐的当代大学生，以崭新的文化心态和种种困惑、迷乱的情绪感应着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他们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新时期小说研究”是国家教委“七五”计划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南京大学中文系考虑到本系曾参加过国家教委主持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工作，开设过一些有关当代文学的课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聚集了一定的力量，考虑到加强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遂于1986年向国家教委申请了这一项目。

获准以后，经过充分酝酿，有关同志进行了分工。决定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时期小说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这三本书是：《新时期小说论评》，由胡若定同志撰写；《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征》，由黄政枢同志撰

写；《新时期小说思潮与小说流变》，由丁柏铨、周晓扬同志撰写。这三本书围绕着一个母题——新时期小说，各抒己见，不求思路和风格上的一律，不求体系和构架上的整一，也不求研究方法上的共同，只求各自写出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与各校同行交流，并参加学术界的争鸣。

当初向国家教委申请“新时期小说研究”这一项目时，我是项目负责人。我没有参加上述三本书的写作，只分工由我写一篇《序》冠于每本书之首。在这篇《序》中，除了交代以上情况之外，我想简要地写下我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感受。我国高等学校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神圣职责，因此，我打算着重从这一角度来谈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新时期文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重大社会变革发生，就有多少次“新时期”出现。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才能谓之“新”。表面、肤浅，过眼烟云的花样翻新，违背客观规律、揠苗助长的强扭之新，都不是真新，是假新。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时期文学”，是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但是这里有两种情况必须引起注意：一种情况是，尽管作品的文本出现在新时期，但它并不具有新时期的时代精神，从灵魂上说，它不过是前代文学之国的“遗民”而已；一种情况是，不仅作品的文本出现在新时期，而且它具有或强或弱的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它是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的文学，这才真正是我们应该加以重点研究的对象。至于前一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只有供研究者参照、比较的价值。象《班主任》这篇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面貌一新的小说发表之前那段时期内

的许多老面孔的作品(有些是“文革”文艺的余绪),象《歌德和“缺德”》的文艺观以及后来多次变相出现的类似陈旧的文艺观,象某些以“左”批右的往日文艺思潮的遗骸,象近几年出现的抛弃社会使命感和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而“玩文艺”或依附商品化势力而“卖文艺”的貌“新”而实旧的东西,以及种种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前一种情况,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从作者的文化心态来看,很难说它们具有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自然也很难将它们列入真正的新时期文学。由此可以说,写在和发表在新时期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新时期的文学。

那么,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呢?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是以社会主义对“人”的发现和思想的新觉醒为前提,以认识和提高国民文化心态为要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为基石的新人本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精神。这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文学上的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是崭新的文学,它在文学观念、思维模式、主题选择、表现形态、审美特征等方面,不仅大大突破和超越了建国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而且大大突破和超越了作为新中国文学之前奏的延安《讲话》以后的工农兵文学,甚至还可追溯得更远一些。

新时期文学是在深刻感受了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和蒙昧主义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发展起来的。思想解放就是启蒙,就是人的新觉醒。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启蒙文学,表现人的觉醒的文学。所谓“启蒙”,决不是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所企望的那样培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抗力量”,更不是所谓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用符合新时期历史要求的新的理性原则,去审视

和裁决走过的历史与面临的现实，把人的思想和思维模式从僵死的教条和“左”倾的“原则”中解放出来，给人的精神注入崭新的活力，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心态。新时期文学中有大量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散文、报告文学、杂文以及文学评论等，一反多年破坏了人际关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反多年压抑了人的精神的现代造神运动，深刻地表现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矛盾，并深刻地反思历史、正视现实，从而揭示出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觉醒意识：人，当代之人，在新的理性原则的基石上，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在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新人本主义的觉醒意识曾有两次萌发过，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一次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均未得到发展，尤其是后一次，因思想解放的流产而遭到扼杀。在文学界，以王蒙等作家为代表的觉醒意识断了线，直至新时期到来，他们的作品才作为“重放的鲜花”而再度面世。

为了认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精神，我想在这里对启蒙主义在我国命运略作分析。

“启蒙”，英文叫 Enlightenment，俄文叫 просвещение，基本含义是“照亮”，这就是说，用先进的理性之光照亮人们愚昧、黑暗的头脑，启迪人自身的觉醒。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讲“开启民智”、“开通民智”，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用什么样的“理性之光”去照亮人们的头脑，又是一个问题。“启蒙”的反面是“蒙蔽”，是“愚民”，即用落后的、反科学的某种思想去污染和堵塞人们的头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启蒙主义运动，以唯物论哲学及“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的理性原

则批判唯心论哲学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但在我国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启蒙主义运动。没有深厚启蒙基础的政治行动是缺乏理性指导的行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启蒙主义总是夹在急迫的政治行动中煮“夹生饭”，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有所发展，但缺乏深度和力度。照理说，马克思主义应该继承人类文化启蒙史上的一切精华，开展一个更科学、思想境界更高的启蒙主义运动，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理性原则，使人消除种种新旧愚昧和偏见，真正变成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人”。但这一任务没有完成。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的盛行，影响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人民又面临着新的蒙昧主义的威胁。这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清醒的马列主义政治家往往只能用生命和苦役去殉神圣的启蒙事业了。苏联的“清洗”，中国的“文革”，就是教训。“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总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提供反社会主义的突破口，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启蒙有两种类型：一曰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这里所说的“感性”，是从认识论上讲的，不是从美学上讲的），一曰理性的、文化心态造型的启蒙。前者是初级的启蒙，见效快而不彻底，可以在全民文化素质低的基础上进行；后者是高层次的启蒙，见效慢而彻底，只有在全民文化素质较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两者有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有不同的作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启蒙运动主要属于前一种类型。“五四”运动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高举

着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人本主义思潮一度高涨，这本是一场高层次启蒙主义运动的良好开端。当时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着手进行理性的、文化心态塑造型的新启蒙主义运动，在文化领域里引起了巨大反响。鲁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重新塑造国民灵魂的问题。众多的西方文化思潮传入中国，点燃了反叛封建传统的新人本主义启蒙之炬，而代表着人类新觉醒和新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疑大大推动了中国方兴未艾的启蒙主义运动。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我们这个受苦太甚、科学文化落后的民族首先“要炸弹与狂呼……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②所以，很自然的，启蒙主义运动便在没有达到一定深度时，很快地转为直接的政治行动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煮了“夹生饭”。历史老人在这方面显得十分吝啬，他不给中国一个从事彻底的高层次启蒙主义运动的机会，他使人们在求生存的紧迫政治斗争中无暇也无力顾及高层次文化心态的塑造和高层次理性原则的建立，而只能接受初级的、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所以一次次地“反封建”，反到八十年代我们还惊呼“五四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一次次地为人的解放而呼唤，共产党人为此而斗争不息，但到十年动乱中人仍然不被当作人。

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人本主义的基础不强，它主要的是引导人们为推翻旧制度而行动，而顾及不到引导人们为否定旧意识而思考。饥寒交迫、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在这种启蒙下燃烧起了翻身闹革命的巨大政治热情，他们懂得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直接意义，懂得了“赶走侵略者”也直接关系到一家一户的切身利益，懂得了跟共产党走就是光明大道，懂得了毛主席是“大救星”。这

种启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也留下了一个高层次启蒙的大空白，待后人来补上。它启迪了“革命”之情，却忽略了“树人”之本。显然，建国之后，单靠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已经不能引导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了。这种初级启蒙的最大局限性是，它不能以丰富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确立“人”的意识并从而使人的头脑现代化，不能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性原则武装大众，不能从根本上清除人的文化心态中那些封建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于是人们很容易从旧的愚昧、迷信中解放出来，又陷入新的愚昧、迷信；刚刚反对了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又立刻去维护新的封建特权思想；昨天才把旧社会的统治者赶下台，今天又把新社会的人民领袖看成“好皇帝”。他们没有发现“人”的价值和尊严，没有新的集体主义和法制观念，或则把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当成“奢侈品”，或则把利己主义和狂热的无政府主义当成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们实际上不懂也不要为之服务的“公仆”，而只要为之作主、请命的“青天大老爷”。“左”倾教条主义与封建主义残余相结合，便是现代迷信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没有经过彻底的高层次文化启蒙的民族愚昧无知的悲剧。悲剧结束以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期，改革开始了。但是，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逼着改革者不得不做深沉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为什么阻碍重重？为什么一搞商品经济就出现物欲横流、超前消费、道德沦丧、知识无用的现象？为什么一方面发财者去烧香、拜佛、赌博、修祖坟甚至嫖娼纳妾，一方面小学危房无人维修、教育战线叫苦连天？为什么本来是很好的一些改革措施到了实际生活中就被“吃

掉”，变形，取得的是“相反效应”？为什么平等、文明的竞争搞不起来，而投机倒把、以权谋私的腐败之风却屡禁不止？……人们这才发现：愚昧无知、精神贫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毫不相容，不从根本上重新铸造国民的灵魂，一切改革将半途而废。要实现民主，必须首先造就懂得国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人，而不经马列主义启蒙之炉烧炼的人，就没有履行民主权利的筋骨。所以，不管从哪方面看，过去煮过的“夹生饭”还得重煮。只有物质的追求，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

我在这里还想指出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不能代替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④

启蒙离不开文学，没有审美教育的启蒙也是初级的启蒙，跛脚的启蒙。我国新时期文学已经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探求意识，表现了启蒙主义精神，在现代

启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自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精神中，还包括着上述两种类型启蒙的不同高度和深度，但从总体上说，它正突破和超越那种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低层次启蒙，而向理性的、文化心态塑造型的高层次启蒙突进，并已取得可喜的成就。如它对封建愚昧、现代迷信的批判，它对“人”的发现，它对人道主义的弘扬，以及它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都属于高层次启蒙，已有很好的社会效果。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能够从多年习以为常的初级启蒙向高层次启蒙过渡和突进，首先是因为作家本身的文化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的僵化模式已被否定，他们反映现实的独立思考的主体精神得到了确认和加强。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学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是表现新的社会生活、满足审美要求、丰富提高人的精神世界，以此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事业。文学不必再单纯从政治运动和政策条文中寻找“灵感”（即所谓“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这样，它的视野大大拓宽，并且与自身的审美特性取得了密切联系，此其一。其二，文学从与初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启蒙相适应的简单教化意识，转向与高层次、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相适应的复杂思考意识，文学主要不是向读者提供学习、膜拜的“榜样”（如“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而是向读者展示出启发思考、增长智慧、陶冶心灵的种种审美形象。从三十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一个观念：它要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学习的榜样。我国文学也受其影响，至“文革”形成“三突出”的新古典主义模式。这种观念，表面看起来是重教育、重启蒙，实质

上是以简单的政治导向代替了人的独立思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往往是以新迷信反对旧迷信。新时期文学打破了这一观念，它不再是板着面孔“教导”读者，而是叫读者面对作品所描写的丰富复杂的画面进行思考，在美的享受中接受了“精神的洗礼”——思想教育和文化心态的塑造。其三，文学的歌颂与暴露，也从简单的政治导向型转向复杂的文化心态塑造型，从而使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人生的探求意识大大加强。在新时期文学中，不论是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还是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品，不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不论是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笑引人思的喜剧……不仅歌颂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都贯穿着或强或弱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人生的探求意识。在暴露中批判，在批判中启蒙，在启蒙中探求，以社会主义的新理性原则审判一切假、丑、恶，表现出社会主义新人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对一切从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认同。新时期文学以新理性的锐气，对极“左”思潮、封建愚昧、现代迷信、官僚主义以及一切政治市侩和经济市侩，一切腐败堕落现象……展开了无情的暴露和批判。报告文学的崛起正说明了这种社会批判意识的强化与“干预生活”的急迫性。

总之，新时期文学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继承、发扬、突破和超越，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文化心态塑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勿庸讳言，新时期文学在自身发展中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些倾向如果得不到克服和纠正，将再一次使启蒙主义煮“夹生饭”，将丧失掉新时期文学的活力。

第一，滋长了一种贵族式的、远离现实生活的“玩艺

术”的风气。有些作家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态度冷漠，社会使命感大大削弱或者丧失殆尽。有人居然说社会使命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而加以否定。如果仅仅去埋头艺术的探求，哪怕是“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探求，只要严肃认真，也未尝不会无助于文学事业。问题在于，有些人既无社会使命感又不懂艺术而自作“高雅”、故作“精深”地去胡编乱造，欺世盗名。于是出现了一些玩弄技巧、没有灵魂的“作品”，被讥为“玩文学”。强调文学的“本体”，变成了单纯追求形式以至轻浮地玩弄形式。他们忘记了或者不相信文学家应该是“精神界之战士”，而一心想躲进“象牙之塔”去经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艺术乐园”。有的作家不仅玩弄形式，而且玩弄内容，如抛弃爱情的社会内容，只去表现“性”意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向来重视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重视文学的启蒙教育意义。狄德罗把文艺视为讲坛和学校，陈独秀把文学视为“社会之大学堂”。今天的“玩艺术”者，在抛弃了初级启蒙的政治教化的同时，连高层次启蒙的深刻教育意义也抛弃了。这种“滑坡”现象一是出于对多年流行的政治实用主义、“为政治服务”的反动，一是出于对现实中复杂问题的胆怯、懦弱的逃避，有的则是用艺术上的自我陶醉掩饰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心理。

第二，滋长了一种市侩式的、投降商品势力的“卖艺术”的风气。如果说第一种风气是打着“探索”的旗号盛行起来的话，那么这第二种风气则是打着“改革”的招牌而行事的。应该说，许多探索小说在艺术上是颇有贡献的，但“玩艺术”者是对探索的歪曲和乱用。“玩艺术”者要钻进“象牙之塔”，“卖艺术”者则拜倒在赵公元帅的足下。为了捞

钱，他们粗制滥造，炮制种种黄色的、黑幕的小说；为了捞钱，他们不是以社会批判者和启蒙者的良知去反映经济改革的复杂进程，而是去为缴了“订金”的企业家写广告宣传式的“报告文学”。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作家不能不言利，要观念更新；不要穷酸儒酸，斯文扫地好！”是的，作家不能不言利。鲁迅就曾说自己写文章是为“稻粱谋”，但他却从来没有要过今天某些作家的“创收”手段，他不管多么需要钱，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社会使命感而去迎合商品化势力。是的，我们的观念要更新，文学运动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但是，作家更应该去研究经济改革的新现实对人的品格、心灵的影响，研究新的文化心态的出现，研究社会主义文学面临的新任务，写出反映改革事业的复杂矛盾、艰难历程的作品来，而不是急忙地去“卖艺术”。文学自然有商品的属性，但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文学这类“最高的精神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是根本不同的，他批判过这样一种观念：“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④。可惜马克思批判过的这个观念，目前在我们的文学界正作为“新观念”流行起来。尽管文学作品也具有某种商品性，但文学事业的灵魂具有天生的排商非商的品格。屈从于眼前经济利益的人，只能成为市侩，而不可能成为作家。在考虑到文学的“经济效益”时，不应该鼠目寸光地去牺牲文学的社会使命，也不要把读者的审美要求看得太低了。读者层，做为一个整体，代表着精神的渴求，可以骗他一时，不可能骗他一世。因此，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有好的社会效益的作品，即真正满足读者崇高精神追求的作品，最终一定会有“经济效益”的。反之，那种暂时赚钱的赝品，终究也不会有什么“经济效